

G40-09712/1

杜威教育论著选

赵祥麟 王承绪编译

杜威教育论著选

赵祥麟 王承绪 编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45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本

统一书号: 7135·001 定价: 1.75 元

前 言

为了了解和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我们编译了这部《杜威教育论著选》，供教育理论工作者参考，并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西方教育论著选课程的教材。

杜威是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继皮尔斯、詹姆斯之后，把实用主义哲学加以深化，并结合自己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长期实验，具体加以应用，形成一个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美国在经历南北战争（1861—1865）后，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处于大扩张和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美国的经济迅速地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是，美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激烈变化和严重失调，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因此，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在教育领域中，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还是继承欧洲大陆和英国旧学校的传统，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仍占统治地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目的在于改造旧学校，使新一代具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品质，能顺利地投入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去，并适应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藉以

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作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者，杜威写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本书选译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教育、哲学著作，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大体上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和整个发展过程。

下面就本书选译的主要内容，作一些初步的介绍和说明。

(一)

杜威于 1859 年生于美国阜蒙特州柏灵顿市。他 1879 年在阜蒙特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和乡村小学教过书；1882 年入新建的霍布金大学研究哲学，1884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执安大学讲授哲学。杜威从事教育活动和著作，主要是 1894 年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以后开始的。1896 年，他创设了芝加哥实验学校（通常称“杜威学校”），作为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学校只存在八年，于 1903 年停办。据杜威自己的回忆，芝加哥的十年对于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著作就是他在这个期间发表的。

《我的教育信条》(1897)是杜威早期的一个纲领性的著作。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是儿童自身的社会活动；教育是经验的继续改造，也是社会改造的唯一的真正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杜威非常强调教师对

“改造社会”所起的作用，认为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职业的尊严”，教师“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

《学校与社会》(1899)是他对芝加哥实验学校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几个演讲汇集成的一本小册子。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杜威首先从美国“工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以及教育应当怎样适应这种变化，来论述教育上的一切问题。他要求学校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根本改革。他主张把各种类型的作业(如纺织、烹饪等)，自然研究、科学常识、艺术、历史引进学校，使每个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在他看来，如果每个学校都成为他所设想的“雏形的社会”，儿童在其中受种种的熏陶和感染，那么他所谓的“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就有了最可靠和最好的保证。在教学方法上，他尖锐地抨击了传统课堂的那种方法，称之为“静听”学校，很少给学生活动的余地。他说，很久以来，教育的重心是教师、教科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不是儿童本身的直接本能的活动。新学校把这个重心转移到儿童生活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儿童与课程》(1902)里，杜威提出教育过程中哪个因素最重要？是儿童呢，还是课程？他列举了两个对立派别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课程教材比儿童自己的经验重要得多，重点放在教材的逻辑分段和顺序上；另一派认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我们必须以儿童为出发点，决定学习质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杜威认为上述两派观点都有片面性，都很难达到合乎逻辑的结论。他自己则认为，

“儿童和课程仅仅是构成一个单一的过程的两极。正如两点构成一条直线一样，儿童现在的观点以及构成各门科目的事实和真理，构成了教学”。在这里，杜威似乎是试图把“进步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调和起来。可是杜威又明确地提出：正当的解决办法是使教材心理化，教师所考虑的不限于教材本身，而是要把教材作为与生长中的经验相关的因素来考虑。他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是儿童的问题”。显然，照他看来，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儿童而不是课程。

(二)

1904年杜威从芝加哥大学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1930年退休。20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末，美国进步教育运动迅速开展，1919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的成立，便是这一运动达到高潮的重要标志。杜威的一些重要的教育著作，如《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明日之学校》(1915)是杜威和他的女儿伊夫林·杜威合写的。书中以葛雷、芝加哥地区一些新学校为例，表明当时美国教育的新趋向是使学生有较多的自由活动，并且使校内生活和校外生活联系在一起。在“教育即自然发展”一章里，杜威认为，卢梭提出的教育应当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能力和需要的思想，为现代一切教育事业的努力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在卢梭的启示下，杜威认为学校中求知识的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使学生自己去发现获得知识的方法。全书最后归结到“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这个问题。他认

为容许固定阶级的形成是民主主义的致命伤”。他认为 彻底“缓和”阶级矛盾的唯一根本机构，是公立学校制度。杜威还认为把公共学校制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施行传统的方法，偶尔也有几处改良；另一部分则去应付那些准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是一种社会宿命论的办法，完全和民主的精神格格不入。他表明自己所要求的是一种以“机会均等”为理想的“民主主义”的教育。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是他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著作，也是他的教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杜威试图把“民主”跟“科学的实验方法”、“进化论”、“工业的改造”等因素联系起来，并探讨它们在教育上的意义，但其中许多东西是他的早期著作中已经提出过的，并不完全是新的东西。全书在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以后，提出一个基本观点：“教育即生长”。杜威认为，在教育上并没有一个使其他任何事物从属于它的目的或目标，最接近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育目的是生长本身的原则。他说，生长的理想和以下两种教育思想不同：一种主张教育就是从内部将潜在的能力展开；另一种主张教育是从外部进行塑造工作。生长的理想则归结为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关于教育上的“民主”概念，杜威认为“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是“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为了适应“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就必须教育社会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必须把生长作为一切成员的理想标准。在这部著作里，杜威还系统地分别论述了教育的目的、经验与思维、思维与教学、教材、课程、职业与教育，等等。最后几章，在归结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时，特别提

出实用主义认识论，即所谓操作的或行动的认识论。他宣称，这种认识论的根本特点，是坚持认识和有目的地改造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在教育上是要使学校中知识的获得与在共同生活的环境中所进行的活动和作业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教学理论和方法上核心的东西。

在《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1928）里，杜威论证了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的关系。在他看来，进步教育对于教育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尊重个人的各种能力、兴趣和经验；充分的外在的自由和非正规性，使教师们能按照儿童真正的面貌来熟悉儿童；尊重自我首创的和自我指导的学习；尊重作为学习的刺激和中心的活动；也许尤其重要的是，深信正常的人的社会的接触、交往和协作是包罗一切的媒介。杜威明确反对传统学校里流行的测验和测量，认为那只是用来作为分班、分级的根据，而对于某种特殊的能力，如音乐、戏剧、绘画、机械技术或任何其他艺术的才能，都是单独跟大量的其他因素一道出现，或者在测验项目单子上根本不出现，这是与进步学校的目的和精神不相容的；教师所关心的也许应是那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即关于儿童的生长，关于在发展中的种种能力和经验，而这些却是不能测量的。

（三）

杜威退休后仍继续从事写作，直至1952年去世为止。《我们怎样思维》、《芝加哥实验的理论》、《经验与教育》、《人的问题》是他这个时期里的主要教育著作。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从三十年代起，便从极盛走向衰落。1955年美国“进步教育

协会”的解体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杜威这个时期的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他对于进步学校的一些看法和为进步教育所做的种种辩护。

《我们怎样思维》(1933)，原书于1910年出版，1933年改写。杜威把思维看作从疑难的情境趋向于确定的情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以下五个步骤：(1)暗示，(2)问题，(3)假设，(4)推理，(5)验证。杜威认为科学的发明和发现，都是按这个方法进行的，因此，称它是“科学方法”或“实验方法”。关于怎样把上述思维方法应用到教学方法上去，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有关章节里，已经做了比较详细而又概括的阐明。

《芝加哥实验的理论》(1936)是杜威自己关于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回忆和总结。他指出，芝加哥实验学校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把学校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首要的因素是使“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相协调或平衡，目的是培养个人和别人共同生活和合作共事的能力；因此，他宣称，实验学校的意图是“社会中心”的。实验学校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拟订一套以社会性的作业为中心的课程和教材，它的基本原理是“一切学习都来自经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要在儿童当前的直接经验中寻找一些东西来解决教材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

《经验与教育》(1938)是杜威晚年的一部重要的教育著作，是由于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教育受到其他教育思想流派的挑战和非难而写的。他埋怨人们喜欢用“非此即彼”的公式进行思考。在分析了“传统教育”和“进步教育”的特点

之后，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和“旧”，而在于对经验须有正确的理解。于是，他进一步阐明自己所坚持的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是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他提出了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原则，作为衡量经验是否具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他看到，进步学校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知识性教材的选择和组织问题，于是强调研究教材的循序组织这个问题的十分重要性，但他仍坚持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予以解决。

《人的问题》（1946），包括杜威晚年写的论文三十多篇，我们选择其中有关教育思想的四篇：《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1938）、《民主对教育的挑战》（1937）、《科学与哲学之关系是教育的基础》（1938）。在这几篇论文里，他仍然反复强调“民主主义”和教育的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要使“民主主义”能够延续下去，“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主要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可靠的工具”。其实，这些主张，在他过去的著作中已反复提出过，不过现在提的更为强烈，更为尖锐，这是和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引言（1952）是杜威的最后一篇教育著作。在这里，杜威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进步教育运动的联系，并对这一运动究竟取得什么成就作了一个估计。他认为，进步教育运动最广泛、最显著的成就，是引起课堂生活富有意义的变化，这具体地表现在对于生长中的儿童的需要有更多的认识，师生关系变得“富有人性和民主化”了。不过他也指出，这方面的成就还只是“气氛上的改变”，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和渗透到教育制度的基础里去。至于

旧教育最根本的“权威主义”，还以各种的形式存在着；把教学作为“完全的师生协作的活动”，还多半是一个谈论的题目。

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杜威对旧学校中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的批判，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关于学校应当怎样以最好的方法授予儿童更多的、可靠的知识这个问题，尽管杜威经常强调教材的选择和组织十分重要，但是他所提出的标准，包括根据实用主义认识论所提出的那些教学理论和方法，一直如此模糊；即使在这篇总结性的著作中强调的，如“学习是一个生长的方法”，“教育过程是一个学习人类生长的手段和方法的过程”，等等，仍然只是极一般的概念。这对于教师制订教学计划 and 教学方法，很难有什么实际帮助。美国六十年代里进行的全国性的课程改革，要求学生掌握知识的结构，发展人的智力，加强数学、自然学科、外国语，追求卓越标准，等等，实际上就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有力批判。但也决不是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此在教育领域里消失了。它的一些主张，如重视儿童自身的活动、需要和经验，强调培养儿童的首创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以及对于形式主义的批判，等等，仍然引人注目并具有一定影响。

(四)

为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选译了几篇杜威关于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的著作。在哲学方面，选择了《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10)、《哲

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5)这几部著作的个别章节。杜威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者,他的哲学观点离不开“经验”这个字眼;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9页)。杜威宣称,他提出的哲学,“既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也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在他的著作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乃至“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这些词,着重点虽有不同,但经常作为类似的同义语,转换使用。与传统的经验主义不同,他把生物学上的概念引进哲学中来,认为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的连续体。在这个统一的连续体里,经验和自然、人和环境、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作用着,相互连续起来,以至合而为一。这实质上是把自然消融在经验之中,根本否定客观世界离开经验而存在的独立性。按照这种观点,在“经验”这个字眼下隐藏着的恰恰是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本书选译了《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1931)、《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1935)、《自由与文化》(1939)等。在这些著作里,杜威一面要求人们认识人类生活在所谓“集体化”的时代,“旧的个人主义已经破灭了”,当前主要是“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一面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改善主义”、“智慧方法”等等以缓和阶级矛盾。

总的说来,杜威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教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教育的一般理论”;事实上,杜威实用主

义哲学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致人们时常称它是一派教育哲学。还应当指出，贯穿在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在他的教育著作中，到处可以看到围绕着这个中心所进行的讨论，目的是如何使学校对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阶级关系起着调节作用。很显然，他的教育理论和政治理论是统一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19世纪末产生一直到20世纪中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形成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体系。上面所作的只是极粗略的介绍和说明，未必中肯，甚至还有错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分析和批判，仍然是我国当前教育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五）

杜威曾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在许多城市和高等学校里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的主要观点，如生活教育、儿童中心、从操作中学，等等，在旧中国曾流行一时，影响很大。杜威于1928年曾访问苏联。在此以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及设计教学法等曾经在苏联广泛流行。杜威在访问时目睹苏联受到美国进步教育运动那么多的影响，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本书特摘录《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五大讲演》，选译《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的部分内容，以及《杜威的生平和著作年表》，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史教研室赵祥麟教授和杭州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王承绪教授负责编译（有旧译本的一般都参照过旧译本），无论在选材上和译文上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

目 录

前 言

1897

我的教育信条..... (1)

1900

学校与社会..... (13)

1902

儿童与课程..... (75)

1909

教育上的道德原理..... (97)

1910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 (109)

1913

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 (118)

1915

明日之学校..... (131)

1916

民主主义与教育…………… (143)

1920

哲学的改造…………… (241)

1928

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 (251)

1929

经验与自然…………… (265)

教育科学的资源…………… (276)

1931

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 (286)

1933

我们怎样思维…………… (297)

1935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 (305)

1936

阶级斗争和民主道路…………… (313)

芝加哥实验的理论…………… (318)